

从冈村宁次的“自白” 看蒋介石的“以德报怨”

□ 谭一青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冈村宁次任日本侵华部队的最高官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这个总司令官在日本投降后受到了蒋介石无微不至的关怀,逃脱了作为战争罪犯应得的惩罚,最后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无罪”,放回日本。冈村宁次回国后出版了他在华战场的回忆录,对他在华的“侵略业绩”作了回顾,并着重记述了战争结束时他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幸免于难”的经过,从而为世人进一步了解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甘心认贼做父,一心反共的真实面目提供了绝好的材料。

冈村宁次作为一名日本军人的全部生涯几乎都

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充当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冈村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1913年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及中国科科长。1925年到1927年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1928年任日军步兵联队长,是制造济南“五卅”惨案的元凶。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了侵占上海的战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历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等职务。曾先后指挥过进攻武汉、打通豫湘桂交通线等重要战役。在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他多次组织对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并在根据地推行极其残酷的烧

语身份为掩护、作地下工作的张光天有过交往,并和他一起到上海龙华监狱去探望过复旦大学地下党的负责人邓君同志,并将我的一部《中国文学大纲》和摩尔根的《进化论》送给了他。”

大概是嫌郝克勇讲的罗嗦,不符合他的需要,不等郝克勇完全讲完,高岗就皱着眉头,问身旁的杨清:“他说的对吗?”

“对。他和张光天说的是一致的。当时张光天确实是由陕西调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党员。复旦大学邓君和他的两个弟弟邓铿、邓创,也都是共产党员。”杨清毫不含糊地回答。

高岗对杨清的回答很不满意,竟然拂袖而起,用手比划着砍自己的脖子,忿忿地说:“你们不要听信一面之词,张光天要不是国民党特务,杀我的头!”

到了这一步,杨清和郝克勇都不好再说什么了。大家默默地从窑洞里退了出来。

事后,郝克勇才打听到,当时张光天被定为陕西省“红旗党”的大特务,正在西北局接受审查。

由于郝克勇没有提供证明张光天是国民党特务的材料,高岗非常恼火,屡次从中作梗,迟迟不让他去见毛主席。郝克勇等得心急,而河南前方三十八军工委和赵寿山更是心急如焚,不断来电催问。高岗把

这些电报全部扣压,不准送毛主席。贾拓夫实在看不下去,与高岗争执了多次。高岗固执已见,贾拓夫也无可奈何。

贾拓夫号称“陕北才子”。这天晚上,贾拓夫来到郝克勇的住处,一进门就说:“你的事情受到了很大的阻拦,可说是‘上不通天,下不达地’。我想了很久,给你出个主意。”

他接着说:“你给赵寿山发个电报,内容是请求给你带回临潼的那个警卫排,继续发给经费、给养和臂章。电报起草好后交给我,由我设法送给毛主席去批发(给三十八军发报要经重庆办事处,而西北局不能直接和重庆办事处通报)。这样便可以绕过高岗,由我向毛主席说明你已到西北局久候未见的原委。”

郝克勇听了大喜,当即提笔起草了给赵寿山的电文。贾拓夫拿着电报,第二天就去枣园见毛泽东。他将郝克勇在西北局机关久候的情况,一一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严厉谴责了某些机关、某些干部中存在的分散主义,当即在电报稿上批示:“发重庆。克勇致勤电——请继续发给经费给养,叶剑英办。”随后即通知西北局,让杨清陪同郝克勇,单独前往枣园会见。

(待续)

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犯下了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1945年11月，延安的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公布了日本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第一号战犯。对此，冈村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最初指定我为战犯的，是1945年11月某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当时，共产党不过是一个地方政权，在延安，指定和发表了日本人战犯约两万余人，只是外国报纸报导了这件事，中文报刊则未予理睬，也没有传到日本国内，所以许多人都不知道。延安提出的第一号战犯就是我，第二号人物是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我的前任者多田骏大将，第三号人物是驻山东省的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康中将。”“中共把我当做第一号战犯，在以后，仍坚持不断地对我进行谴责，1949年在同李宗仁的和谈条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要求把我交出来。从我回日本以后直到今天（1965），正如报纸上经常报道的，还是经常不断地骂我。”

像冈村宁次这样的重要战犯最终能够逃避任何制裁，起初，连冈村本人也没想到。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担任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两次）、总司令官，都是在中国前线服务，特别是最后处于最高地位，所以从战争结束一开始，我就作了这样的精神准备：无论如何免不了要成为战犯，并被处以极刑（死刑）。”“真不知是什么命运，经过许多曲折，最后被军事法庭宣判为无罪而返回日本。”

冈村之所以能够如此地道遥法外，全得力于蒋介石庇护，是蒋氏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推行所谓“以德报怨”政策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日本投降的当天，8月15日，蒋介石发表了“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说，竟然要求中国人民“爱敌人”，强调“如果以暴力答复敌人往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冈村在回忆录里说：“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官民对日本人的态度，大体上要比预想的良好。这大概是由于民族性的关系，但最大的原因，我想是由于蒋介石委员长8月15日‘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说，得到了广为宣传的缘故。”冈村又说：“8月17、18日，在北京和上海，很快出版了中央政府系统的报纸，在第一期里，都根据蒋介石委员长的方针，发表了社论，要点是：‘不能以暴易暴，要把过去的争斗付诸流水，对日本人应不念旧恶，不施行侮辱、暴行，而保持大国民的风度’等等。”在这样气氛中，投降的日军获得了格外的优待。9月9日重阳节，驻汉口的中国军司令部竟将满载月饼的卡车开到了日军司令部，以慰问投降了的日军军官。

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壮了投降者的胆，日本人临走还不忘向中国人示威。冈村宁次命令他的部下说：“停战和撤兵，要在严格的军纪和巩固的团结下进行，要使中国方面既产生犹如对待秋霜烈日那样的畏惧，又感到衷心的敬爱，秩序井然，正堂堂地进行。”不仅如此，侵略者们还向其占领区的中国方面发出通告，谓：“对于非法扰乱治安者应看作是不受蒋委员长的统制，不得已时，可采取断然的自卫行动。”冈村宁次还进一步交给其部下以“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武力”的权力。

1945年9月12日，冈村宁次被何应钦任命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冈村在9月8日的日记中毫不掩饰地称何应钦是他的“中国知友之一”，回顾了他们早年的友情，说：“他就是具有这样人品的人，是亲日家。我现在居然要向这一亲切的何应钦投降，实是不可思议的因缘。”同年12月23日，冈村受到了蒋介石的亲切接见。蒋对冈村拒不向八路军投降，从而使国民党军顺利接收表示了感谢，并对冈村的生活健康状况表示了热情的关怀。冈村在日记中写道：“蒋委员长始终浮现微笑，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对他提供这一见面的机会，并对我说了关怀的话，感到敬佩。”

此后，围绕着冈村是否应受惩罚的问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包庇的政策。冈村在日记中得意地说：“经常和我接触的中国方面的参谋们，全部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亲日家，所以最近相互关系非常亲密，他们经常向我们透露内部情况。”因此，冈村本人对于国民政府历次讨论关于他的处理办法的会议情况了如指掌，甚至会上每个人的发言，他也能如数家珍地一一道出。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总之，中国政府特别是军事系统方面，为了对付民众和外国，就表示一定要把我当作战犯，但在内心，却对我极为同情，似采取了等待时机的态度。”

因此，当国内民众问及冈村宁次的处理问题时，国民政府的代表总是十分窘迫，含糊其辞。1946年12月9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的延安来电称：“日本第一号战犯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竭尽杀戮掠夺之能事，现在居然被看作为蒋介石之朋友而受到款待。”此后，上海的民众和中外记者纷纷就冈村问题责问国民政府，民情激愤。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却对冈村呵护有加，他们派人通知冈村说：“从国际关系方面考虑，冈村暂时不回日本为安全。但为了堵住众口，也许要进行审判，但这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同年11月，（下转30页）

华率红十五军团参加了东征战役。突破黄河天险后,即打退晋绥军的反击,攻城略地,取得胜利。3月12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大麦郊召开作战会议,确定和布置了“分兵南下北上”的作战行动。

当天,会议结束后,徐海东骑马由大麦郊返回双池镇,途中路过一个村子时,遭到几条狗的追咬,座骑受惊后奔跑起来,飞一般地朝前驰去。跑出村口时,恰又遇到一支红军队伍,眼看惊马就要将一个闪出队列的战士撞倒在地,徐海东急忙使出浑身力气,用双手勒住马缰,猛一下将惊马调转过来。他正想看一眼是不是碰着了那个战士,想不到惊马前蹄腾空而起,将其从马背上颠落在地,撞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当下就碰掉了两颗门牙。

徐海东当时就昏倒在地,满嘴是血,把两腮都染红了。面部也擦破几块皮肉,血流不止。当战士们将他抬回双池镇时,徐海东还是昏迷不醒,嘴里滴着鲜血。程子华见此情景,急忙喊军团卫生部

长钱信忠来,亲自进行急救。

3月18日凌晨,红十五军团作为“左路军”,由灵石以西地区出发北上。徐海东因伤势严重,又不肯留在后方休养,就被用担架抬着走,随同部队一起行动。北上途中,先头部队抵达太原以西的岔口镇时,徐海东命令军团骑兵团奔袭晋祠,直接威逼太原。阎锡山极为惶恐,当即宣布戒严,急令晋绥军一个师和两个旅加守城防,并从四处调兵遣将拱卫太原。据说,阎锡山还曾发出一道特别命令:“凡击毙徐海东者,赏大洋5万元!”

师庄战斗后,徐海东从被俘的敌三九二团团团长郭登瀛的口供中获悉到这个消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阎老西太小气了!是不是因为我丢掉了两个门牙,整个身价也减了半价……哈哈!蒋介石还以10万大洋悬赏过我的头哪!”

回师陕北后,毛泽东在延长大相寺团以上干部会上总结东征

战役时,还开过一句玩笑:“如果说遭受损失的话,我们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军团长,还丢掉了两颗门牙。”这话随后也在红十五军团广为流传。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亦有如下描述:“……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指挥员。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这个人 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胀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之后,徐海东还曾要求斯诺给他弄“一对假牙”,以“补上他的缺牙”。

由于环境艰苦,徐海东好长时间都不曾补上两颗门牙,平时一张开嘴巴,就露出两个“大窟窿”。这么一副相貌,加上那个永不凋谢的“酒窝”,很引人注目。因此,有人私下也叫他“徐大豁牙”!

1938年初,当作家周立波会见徐海东将军时,因骑马“曾跌掉两颗门牙,现在补上了”!

(上接第40页)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提出要传讯冈村宁次作为证人,而中国政府竟为冈村的安全着想,以冈村在中国方面的业务未了,身体状况欠佳为理由,拒绝让冈村去日本受审。

由于中国民众和国际舆论都不允许对冈村从轻发落,故而中国政府对于审判冈村一事一拖再拖,先等民情和缓,后等东京军事法庭审判工作结束,直到1948年8月才决定公开审判。其时仍有人悄悄告诉冈村:“蒋总统曾想尽量不审判你,但考虑到群众和国际关系,只好下决心审理。不过绝不会处以极刑。”

连冈村自己也认为对于他的审判是一场对付民众和国际的大规模表演。国防部特别为冈村聘请了两名第一流的辩护律师。这些律师在公堂之上刻意掩盖冈村的罪行,公然将侵略者在占领地的掠夺说成是对中国农民的“爱护”。审判期间,东京国际法庭要求将冈村送来审判,中国方面竟宣称:“冈村没有参加过侵华的日本中央系统的组织,他的犯罪事实

只是在中国战场造成的,所以没有必要把他送交东京军事法庭。”经过长达5个月的审判,1949年1月26日,冈村宁次终于被宣判为“无罪”。冈村在回忆录中感激地说:“由于何应钦国防部长为首的军部要人,特别是汤恩伯将军所强硬主张的无罪论,终于占了主要地位,所以才有今天的无罪判决。”“中国政府,特别是蒋总统、国防部高级将领,对我始终一贯的厚意,实为感谢不尽。”

蒋介石为何要对这样一个日本战犯如此地“以德报怨”,如此地呵护备至呢?事实上,他是在利用这个“以德报怨”,对在抗日战争中一致对敌的中国共产党实施“以怨报德”。冈村宁次在蒋介石的保护中成了国民党讨伐共产党的秘密军事顾问,蒋介石为他专门建立了一个国防部第三研究组。冈村不仅向蒋介石充分介绍了“讨伐共军”的技术与经验,而且还自鸣得意地说,他在华北围剿共军时编的一本小册子《剿共指南》,很快就被国民党译成了中文并加以运用了。